

生命的呈现

文/李辉



《沈从文的后半生》
张新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直欣赏张新颖的文字，无论评论或者散文，细腻、从容而内敛。他不爱做慷慨激昂状，不张扬，不煽情，也不轻易做出武断结论，而是更愿意以不露声色的叙述，如同抽丝剥茧一般，让自己的见解渗透于文字之中，从而潜入读者之心。

张新颖虽以文学评论崭露头角，但我觉得他本质上更是一个艺术鉴赏家，对作家、作品，体察入微，尤其文化的韵味，文人命运在时代漩涡中的关系应对，最让他着迷。他喜欢沈从文已有许多年，集中研究已达十多年，这本《沈从文的后半生》，可说是他的诸多特质的集中体现，而他先期出版的《沈从文精读》，早为这一次新的写作，打下坚实基础。

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曾经引发读书界广泛关注，一度被淡忘的学界泰斗式人物的晚年悲怆命运，令人感怀叹息。《沈从文的后半生》，不妨也叫做“沈从文最后四十年”。张新颖以编年体形式将沈从文的后半生娓娓道来，沿袭以往写作风格，看似“流水账”式的平淡叙述，却有穿透人心的张力。他不发空洞议论，不做合理想象的推测，沈从文最后四十年的生命历程，借诸多史料的巧妙剪裁、穿插，而得到立体的呈现。沈从文四十年间留下的数百万文字，亲友的回忆，后人的追寻，在张新颖笔下变得鲜活生动，被他整合重构而成一个生命的呈现。■

选摘

一九六一年初，沈从文住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药物治疗、食物调理之外，还以气功和站桩相配合；另外，约半年前左臂扭伤一直未好，这次用蜡热疗法——后来证明也没有多大效果。出院的时候血压是降下来了，但诊断出的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却未见好，心常隐痛就是由此而起。

但在阜外医院的三十五天，对沈从文来说，就算得上一段难得清闲的日子了。他读了一本新译的《托尔斯泰评传》，又读了《安娜小史》和《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边读边做了札记；之后又读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读托尔斯泰传又激起了他写作的冲动：写一部以家乡子弟抗日为主题的书——这本来也是他多年前的一个愿望。他想好好收集自己家中以及田、刘诸家和陈渠珍等人的材料，于是写信请求大哥：“尽可能把你明白的材料记下来，由祖父起随日记下些，不拘记多少。我们可以共同完成这个作品，也是对家乡一种责任……特别是那些朴质勇敢的兵士！我因为从他们身边长大，极懂得他们的情绪。过长沙时，还看过得余集他们出医院的一队人一次训话。记忆永新，动人得很。当时写《云庐纪事》就打了个腹稿，以为会写到廿多万字的。一搁下来即十多年。现在因读托的传记，忽又想到如果体力能许可，写完鼎和传记后，第二本书将是这个未完成的故事，有几个人一定可以在笔下写成活人的。”

对《安娜·卡列尼娜》，他略有微词：“写事，笔明朗，如赛马、猎鸟、农事收获，及简单景物描写，都很好。至于写人，写情感变化，有些过细，不大自然，带做作处，似深而并不怎么扎实，乍看好，较仔细看，即觉得不十分好。托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是有道理的。评传说英译本将重要议论涉及批评社会制度，思想激烈部分多删节，因此重点转成‘恋爱悲剧故事’，不大符合本来目的，评得中肯。周译似即此经过删节的译本，所以讲到社会问题，对话多含糊。”

对《战争与和平》，则推崇备至。他读的二十年代即结识的老友董秋斯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极好，也译得好。看三册火焚莫斯科，不过用一章文字写，却十分生动。不过从彼尔眼中看去，却极感人。写法兵抢劫，也不过用一页文字，写枪毙平民，不过五个人，可是却十分深刻。真是大手笔。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一次军事会议，却只从一个六岁女孩眼中看到一个穿军服的，和一个穿长袍的争吵，又有趣又生动，真是伟大创造的心！写战争也是文字并不怎么多，不到二三千字，却全局开展，景象在目，如千军万马在活动。都值得从事文学的好好学习！”“又在极大事件、伟大人物描写上，常常作些比拟形容，似乎不甚庄重，可是结果却生意盎然，充满生命，转近自然。”善于学习的可学得很多东西，但是不善于学习的，“只记住什么人评论托或其他的思想意识”、“论断”，不去学“具体的长处”，是没有丝毫帮助的。

沈从文是和做《人民文学》编辑的妻子谈托尔斯泰的，自然就谈到时下的创作：“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和“在这里杂志上看到几个短篇”，他很直接的印象是，“都不好。都不会写，不会安排故事，不会对话，不会写人。散文和诗写到景物时，都不知如何着手，文字不够用似的，也一点不真实。”他说眼下的新文学“不能给多数人比玩麻雀牌更大一些的快乐”，这是不是因为“新文学和这个多数生活，根本上即并无什么关系？”这个疑问，其实近于根本性的质问了。“新作品对他们一点都不需要，你们可未曾注意到……你们可以说并不懂读者，作者也不懂，批评家写的文章，和一般读者且隔得更远了。许多作品只有准备写文章和教师要看的，和多数读者全无关系。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事情！”

住院期间收到汪曾祺一封信。汪曾祺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农

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信正是从他劳动的张家口沙岭子寄来的。沈从文特别喜爱这个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如今看着他身处逆境，心情可想而知，但他却写了一封异常鼓励的信，语重心长。以前，他曾经用过骂的方法：一九四六年汪曾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此信不存，却在汪曾祺记忆里难以磨灭；他还记得老师同时让三姐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现在，下放劳动可比当年一时找不到工作要严酷得多，沈从文的回信因此也大为费心。他先打了底稿，用钢笔写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十二页，六七千字；从医院回家后，又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一次寄出。

沈从文写道：“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我的生命就是在一种普通人不易设想的逆境中生长的……这生活教育，也就变成自己生命的营养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丰富……你如能有机会到新的人群中去滚个几年……没有别的话好说，接受下来吧。高兴的接受吧。我赞同你！”

他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描述自己家庭里的情形：两个做工人的儿子，每到周末回家，打地铺，“卧听柴可夫斯基音乐，谈新机床某一轮子的转数”；家里还多了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能歌善舞，性格极好，“是我的侄女，到这里来已改成女儿。”自己呢，“对于外来干扰，人事得失，则一律用‘微笑’招架抵挡！”

沈从文当然要谈写作，从自己谈起，目的则是谈到汪曾祺，要给他坚持的信心和勇气：他说自己还幻想“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不过万一有什么人说这是“修正主义”，还是“招架不住”，所以“特别是怕批评家”，“再也受不住什么歼灭性打击批判”；“可是我却依旧还是想劝你在此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样的理解……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完成这个愿心！”

“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做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又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成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

一九六二年汪曾祺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这多少让沈从文觉得欣慰，他在十月给老友程应镗的信里说汪曾祺的现状，“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有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汪曾祺的点点滴滴，他这个老师都看在眼里；不仅如此，还忍不住为他这个学生大抱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文学批评的感受力和判断力

文/傅逸尘

考察批评与创作的分家从何时开始可能有些麻烦，但我想质疑的是文学批评，为何一定要与创作分离？分离后是有利于创作，还是相反？对此，我有些迷茫。在我看来，创作与批评的本质差异不在于思维方式，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在作家与批评家的写作中都是存在着的，表现方式的不同才是关键。批评家普遍不从事文学创作，因而不懂文学创作的逻辑性似乎不够充分，但对文学的感受力相对较弱却是事实。而且文学批评的分工也越来越“专业化”，古代与现实、当代的分离正确与否就不说了，文学样式的分化又有多大的合理性？研究诗歌的不读小说，搞散文的对戏剧竟一无所知，如此的“专业化”，有利于文学批评的发展吗？

莫言曾说，当他刚看完《喧哗与骚动》前面2万字的序言，就觉得福克纳这个老头太好了，于是产生了要建立自己的文学共和国的激情。我不知莫言是否将此书读完；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一种文学的观念，一种写作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感觉。有此一点，他就能将深厚的中国经验与童年记忆整合到一起，创造出只属于他的文学王国。莫言何以对《聊斋志异》格外推崇？也是基于作家的文学感受力，而当下的文学批评却离这种感觉渐行渐远。

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资源大多来自西方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与方法。为批评者，如果不能言必称种种主义或某某家似乎就取法乎下；而所谓学术论文如没有很多注释就缺乏学术性与学理性。这样的批评能感受到作家的情感与体温吗？龙应台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谈及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说，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单纯”的能力——就用文学来看文学？难道每给一个文学奖，我们就先检讨作者的政治立场，或者先检查他是不是一个什么“主义者”？把龙应台的反诘移花接木过来，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批评还有没有“单纯”的能力——就用文学来看文学？来判断文学？这个“文学”，我们把它权作“文学的感受力”。回到文学自身，回到文学的细部本是文学批评之分内的职责，现在反倒要极力去呼唤其回归，这多少有些反讽的味道吧？

中国文学批评如何走出脱离创作实际与自说自话的尴尬窘境，路径当是多种，但提高文学批评的感受力和判断力肯定也是一种有效且迫切的方式。■